

出无论是宋代的“团行”还是明代的“铺行”都仅仅是官府强制编置的、功能单一的赋役组织,甚至不能算是一种实体,根本算不上工商合作组织。清华大学余清良《明代“铺”、“境”、“社”含义考辨》考察了明代基层乡治组织“铺”、“境”、“社”具体含义与功能。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张金奎《明初山东枣强移民小考》指出枣强籍移民大量迁入山东的时间在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并非“洪武二年移入”。其原因是,明中期以后政府欲控制人口,下令迁徙之人返回原籍,但迁徙之人不愿离去,故虚构出自洪武二年就已经迁入此地的先祖来证明本族移入已久,以求长居此地。

社会思想与文化方面。吉林大学王剑《明懿文太子陵祭逾制考论》试图揭开南京明懿文太子陵一年九祭皆用太牢这种超越常规的祭祀礼制形成过程,以及隐藏其中的政治动因。东北师大李媛《塑像与木主:明朝祭孔形象的变迁》关注明代孔子祭祀使用塑像还是木主的问题,剖析明代统治者思想变化以及地方的回应。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陈时龙《明人对书院的态度——以明代方志的书院记载为考察对象》以明代方志中的书院记载为基本参考资料,举出土人对于书院的三种态度:书院非制、属于官方学校的辅助、书院是祭祀先贤之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解扬《晚明经世类书编纂的使用追求——以冯琦(1558—1603)〈经济类编〉为中心》考察冯琦所编纂《经济类编》内容,通过书中收录材料的选取、分类、编纂来分析冯琦的编纂指导思想与书籍应用。东北师大赵克生《从“木铎宣诵”到“乡约会讲”——明代地方社会的圣谕宣讲》在历史变迁的背景下探讨了明代圣谕宣讲不同模式的演进,即由明初的“直言叫唤”发展为嘉靖以后的“阐明事理”、“讲行合一”,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新境界,圣谕演绎之学渐趋形成,不同风格的圣谕讲本广泛传播。天津人民出版社张献忠《救亡压倒启蒙——晚明至清初思想的演变路径及其阐释》借助李泽厚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发展脉络的概括“救亡压倒启蒙”来分析总结晚明至清初思想的演变路径,提出晚明思想属于启蒙思想,具有近代性、内生性的,源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张兆裕《〈崇祯长编〉的佚文述记》对《行水金鉴》、《钦定续文献通考》及四库本《明史》所附《考证》三种清代史料中摘引的《崇祯长编》内容归类整理,部分还原了《长编》的佚文。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之间的讨论一直洋溢着肯定与批评的热烈气氛,既深入研讨了学术问题,又弘扬了良好的学风。

(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 赵克生、宋继刚)

## “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学术论坛综述

2011年12月10—11日,“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学术论坛在宁波市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宁波市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文物局协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宁波博物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地的近40位专家参加了本次论坛,就以下6个专题

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关于海洋文化及海上丝绸之路理论问题。进入 21 世纪,海洋问题日益引起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本次会议上,有不少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海洋文化进行了探讨。庄国土《当中国海洋意识遭遇大陆文化——以闽南人的海洋发展夭折为例》建议,应当在“文化”学科中另设“海洋文化学科”,以统括涉海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

〔韩〕郑守一《海上丝绸之路与韩半岛》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实际上是“丝绸之路”概念扩大的结果。“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概念不应当仅指中国东南沿海通向东南亚及更远地区的“地域性海路”,而应当指环绕地球的“全球性海路”。施存龙《“海上丝绸之路”理论界定若干重要问题探讨》也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不应当仅指由中国南方向西通往东南亚及更远地区的海上交通线,而应扩大到“凡有过从中国输出丝绸特征的国与国之际海上交往之路”,并就海上丝绸之路的上下限、是否可以提“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是经过一代一代学者的卓越努力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中包括梁嘉彬(1910—1995 年)。章文钦《梁嘉彬先生与中国沿海边疆史研究》全面介绍了梁嘉彬在沿海边疆史上的研究成果,特别是 1946 年到台湾之后所发表的论著,如《琉球及东南诸海岛与中国》。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由两大干线组成,一是由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南海航线,二是由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在南海航线所经国家中,三佛齐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法国学者苏尔梦(Claudine Salmon)《10—12 世纪的三佛齐,中国和中国商人》(Srijijaya, China and the Chinese Merchants, 10e - 12e s.)认为,三佛齐之所以能够如此清楚地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如此娴熟地运用外交手段,原因为就于背后有中国商人在出谋划策。至少 10 世纪,中国商人就已经在三佛齐定居下来,有的还获得官位,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上,最为重大的事件当数郑和下西洋。时平的《从满刺加“官厂”的设立探讨对郑和航海的影响》分析了郑和在马六甲建立“官厂”的原因,推断马六甲“官厂”是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开始建立的。张箭在《首论罗懋登〈西洋记〉对郑和下西洋规模的夸大》认为,罗懋登《西洋记》这部“浪漫主义的历史神魔小说”,严重夸大了郑和下西洋的规模、航行时间、航行距离、船只数量、船上建筑等数据。

在南海航线所经海域,有许多文物古迹,它们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力见证,更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姜波《南海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南海考古的学术史脉络,包括南海诸岛的考古遗迹,以及南海海域的水下沉船。曲金良的《关于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几个问题》则从理论的高度疾呼:目前中国海洋文化遗产“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威胁、破坏乃至大量损灭,其整体现状令人堪忧”,因此迫切需要“从整体上进行系统研究和系统保护与利用”。李庆新《钱币外流、金银交易与外销瓷——从考古发现看明前期南海贸易》专题研究了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铜钱、铜铤等金属制品,认为我国西沙群岛北礁海域发现的明初铜钱,“或许与郑和下西洋船队有关”。林士民的《海上丝绸之路与越窑陶瓷文化》认为唐宋越窑的陶瓷文化在不同的层面上“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亚、非二大洲的许多国家及地区的文明进程”。李锦绣《从波斯胡伊娑郝银铤看唐代海外贸易》深入研究了 1989 年在西安市西郊唐代

金胜寺遗址出土的银铤。认为这些银铤是唐代中国与波斯海上交往的有力见证,生动地反映了唐代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波斯商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在本次会议上,各国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进行了集中研讨。韩国学者车光镐在《11世纪韩中海路变更的交流史背景》中探讨了契丹兴起后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中国与高丽之间海上交通线路的变化。日本学者榎本涉的《唐—元代日中交通航线的变迁》重点分析了明州(宁波)在中日交往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在15世纪的东海世界,明州不再是经济中心,多极的海域交流开始形成”。

另一位日本学者渡边芳郎在《17—19世纪中国陶瓷器对日本九州陶瓷器生产的影响》认为,中国陶瓷对日本的影响,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的“技术导入”,第二种是对中国陶瓷的模仿,以及在模仿基础上所进行的创新。加拿大学者阿道夫森(M. S. Adolphson)在《12世纪日本铜钱之谜》(The Coin Conundrum in Twelfth Century Japan)指出,铜钱最初输入日本的奥秘在于宗教。由于佛教在日本的流行,僧侣以及贵族施主们需要大量的铜器来制造法器与冥器;中国铜钱输到日本,最初就是被熔化后制造佛教用器的,而是不用作商品交易,但最终引发了日本经济的货币化。

意大利学者白蒂(Patrizia Carioti)的文章《17世纪郑氏海上集团在东亚的国际作用》(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Zheng Maritime Organization in 17th Century East Asia: A Survey),讨论了在明朝灭亡的过程中,面对着欧洲人东来的复杂背景,台湾郑氏政权与日本的关系。钱江《明末清初浙江与日本之间的海上交往——以日本德川幕府末期外交档案史料汇编〈通航一览〉的记载为中心》所涉及的内容在不少方面与白蒂相类似,重点探讨明清之际浙江与日本之间的历史关系。韩昇在《中日关系中的明州及其研究》专首先分析了明州在中日交通线上的重要性与独特性,进而考察了宁波在中日佛教交流中的重要性,指出明州不仅是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而且还是对日文化交流的主要港口。

王金林在《日本佛教的律学、律仪的形成和发展——以唐高僧鉴真和入唐日僧空海为中心》认为,鉴真东渡日本,宣扬佛教律学、律义,建立了严格的授戒制度,奠定了佛教各宗共同兴旺的基础;最澄入华,研习天台宗,回国后创立了日本天台宗,并对鉴真以来的律学、律义作出了创新与发展。林立群在《高丽王子与宁波僧人》中,探讨了高丽王子义天与宋代宁波僧人之间的交往,并且更正了一些不正确的说法。

关于沿海港口与海防制度。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产生与发展,促进了中国沿海港口城市的崛起与繁荣。宁波就是一座因海上丝绸之路而兴盛的城市。金国平《简论宁波双屿港短暂的历史辉煌》,重点考察了16世纪前期葡萄牙人在宁波沿海双屿港的活动。廖大珂则根据欧洲人所绘制的地图,探讨了宁波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他的《世界的宁波:16—17世纪欧洲地图中的宁波港》全面梳理了Liampo(宁波)在欧洲地图上的演变过程,认为“欧洲人记载中的Liampo的地理范围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变的,反映了欧洲人对宁波港的认识过程, Liampo港与双屿港是不同的地理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除了宁波之外,中国还有许多城市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本次会议上,学者们对其他一些港口城市也进行了探讨。冷东《广州十三行与影响世界的茶叶之路》认为,17世纪后,茶叶成了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对中西物质与文化交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广州正是中国茶

叶对外贸易的枢纽。王元林《清代潮州对外贸易研究》,比较全面地探讨了清代潮州对外贸易结构与特点,进出口商品的构成,潮州籍华侨在外贸中的作用,潮州在中国沿海中转贸易中的地位等。法国学者柯兰(Paola Calanca)把沿海城市与海防建设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她的《蓬莱:一座罕见的港口要塞实例》(Penglai: A rare example of a walled harbour)认为,从16世纪中期开始,由于倭患频发,明代的海防建设进入到了全新的阶段;不过,明代的海防设施实际上是根据各地不同的地理特点等因素而因地制宜的,蓬莱就是一座罕见的港口要塞实例。刘迎胜的《宋元时代浙江、福建沿海的巡检司——兼论元澎湖巡检司》认为“元代在浙东沿海几乎全盘继承了南宋时的九寨巡检机构”。他还在大量文献中找到了一些“体现元代继承宋代福建沿海巡检机构的例证”。

关于文化交流、宗教传播与民俗信仰。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领域,不仅包括港口航线、国家关系、商品贸易,而且还涉及到文化交流、宗教传播与民俗信仰等众多方面。严耀中《海上丝绸之路和婆罗门教之来华》以具体史实说明了海上丝绸之路同样是外来宗教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分析了婆罗门教与海上贸易的关系,指出了婆罗门教不同于佛教的特点,并且讨论了婆罗门教对中国沿海地区文化的影响。汤开建《明清之际天主教艺术在澳门及中国内地的传播》对西洋艺术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罗明坚是明清时期在中国内地正式传播天主教艺术的第一人”,而不是许多人所说的利玛窦。

黄浙苏《论妈祖信仰对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作用》认为,“妈祖的出现,是中国航海事业发展的必然”,“其信仰的传播与发展,几乎是与11世纪以后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同步的”。

关于新发现的明代航海图及相关问题的研究。200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的鲍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发现了一幅明代彩绘航海图,西方称其为《雪尔登中国地图》(The Selden Map of China),钱江称其为《明中叶航海图》(本文以下简称其为《明代航海图》)。该图被披露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但至今为止,深入研究此图的文章并不多,许多基本问题尚不清楚。本次会议上,《明代航海图》成了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孙光圻《明代〈雪尔登中国地图〉图式定位及其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学术价值》把《明代航海图》置于中国航海图发展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通过测算认为,该地图“从航海学角度考察此图在航海图学的分类中,无疑应属于航海总图之列”。此图较之《郑和航海图》毫不逊色。后者作为中国古代航行图的杰出代表无可置疑,而前者作为中国古代航海总图的稀罕案例则更加珍贵”。朱鉴秋《略论〈明代东西洋航海图〉》认为,《明代航海图》“是一幅明代福建至东西洋的针路图,按现代航海图的分类,可以说是一幅‘海区总图’”,它的发现,“为中国地图学史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也为研究明代中国至东西洋的针路提供了新证据”。龚缨晏在《也论新发现的明代航海图》中指出,这幅地图应该是1607年之后绘制的;荷兰殖民者于1624年开始入据台湾,但在这幅地图上,台湾的地名不仅很少,而且在画法上有许多错误,更没有反映荷兰人入据台湾之任何迹象,因此这幅地图的绘制时间最晚不晚于1624年。

陈佳荣把《明代航海图》称为《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图》。为了研究《明代航海图》,作者对同样藏于鲍德林图书馆的中国古代航海文献《顺风相送》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考察,并且写成《〈顺风相送〉作者及完成年代新考》在本次会议上宣读。陈佳荣认为《顺风相送》的最初作者应是漳州人吴朴,全书应完成于1593年左右。该文有许多真知灼见,例如认为“永乐元

年”实际上是“永乐十九年”之误抄。陈佳荣在文中还揭露了境外某些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利用现代技术恣意篡改古籍的卑鄙行径。在研讨会上,其他一些学者也对《明代航海图》发表了见解。例如廖大珂指出,由于这幅地图上出现了“国”,“万”,“抚”等简体字,所以,在讨论这幅地图时,应当持谨慎态度。

总之,“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学术论坛是一次高水准的学术会议,必将有力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开展。

(宁波大学 龚缨晏)

##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暨环南海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召开

2011年11月3日至4日,由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海南师范大学和海南省博物馆联合主办,海南省南海区域文化研究基地承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暨环南海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市召开。来自国内外30余所高校及20余所科研机构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主要围绕黎族的历史与文化、百越及环南海地区的考古、百越及环南海区域的历史与文化等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黎族的历史与文化。黎族是开发海南历史文化最为古老的民族,其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均保留着原始状态。林日举的《试论黎族原始宗教信仰长期延续的原因及当代属性》阐述黎族的宗教信仰长期在黎族地区延续的三个主要原因,及黎族宗教信仰的表现形式、主持人、行为方式等,同时指出,随着黎族宗教信仰长期与民俗的结合交融,当代属性已演化为黎族的民间信仰。周伟民、唐玲玲的《论黎族哲学思想和文化特点》认为,黎族的世界观主要包括敬畏和敬仰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师法自然;在文化方面主要体现在具有民族性的织锦文化、树皮布石拍文化、文身文化、烧土陶的工艺文化等。

文身,作为黎族社会曾经盛行几千年的文化,引起学界的重视。王献军的《黎汉文化的冲突:黎族文身的“被禁止”与“被终止”》首先阐述黎汉两个民族对文身的认识,指出两个民族在文身问题上不同认识和尖锐对立,是导致黎汉文化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冲突的原因所在;进而讨论各个朝代汉族统治者对黎族文身所采取的禁止政策;最后指出新中国建立后黎族文身的最终被废止的情况。高泽强《黎族文身文化考察之旅》通过自己的田野考察黎族哈方言文身的变迁情况,指出其变迁的五大特点和变化的三个规律。此外,陈甜甜《黎族与高山族文身功能比较研究》和赖文君《民国时期黎族的文身及变迁》等文章也涉及黎族文身研究。

黎族族群研究,成为黎族研究的亮点。赵全鹏《古代黎族族群的“整合”与“分化”研究》指出,黎族是由多支族群整合而成的,在整合过程中,骆越人、俚人和封建郡县均发挥主导作